

鬼

文化视野中的
唐前志怪小说

GUIWENHUA SHIYE
ZHONG DE
TANGQIAN ZHIGUAI
XIAOSHUO

金官布 著

海外
借



人民出版社



文化视野中的 唐前志怪小说

GUIWENHUA SHIYE
ZHONG DE
TANGQIAN ZHIGUAI
XIAOSHUO

金官布 著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文化视野中的唐前志怪小说/金官布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01-019136-2

I. ①鬼… II. ①金… III. ①志怪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9213 号

鬼文化视野中的唐前志怪小说

GUIWENHUA SHIYE ZHONG DE TANGQIAN ZHIGUAI XIAOSHUO

金官布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43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9136-2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青海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先秦鬼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9
第一节 概念界定	9
一、鬼文化	9
二、鬼故事	10
三、文化结合	11
四、志怪和志怪小说	12
第二节 鬼文化的产生	12
一、灵魂观念的出现	12
二、灵魂—鬼魂观念的转变	16
第三节 鬼文化的发展与整合	19
一、鬼神一体	19
二、鬼神设教	22
三、鬼观念的整合	27
第四节 鬼文化的演变	31
一、先祖之鬼	31
二、神鬼分流	35
第二章 汉魏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的结合	39
第一节 鬼文化的世俗化	39

2 鬼文化视野中的唐前志怪小说

一、巫覡世俗化	39
二、鬼文化的世俗化	45
第二节 汉魏小说发展状况	50
一、儒学轻视和丛残小语	51
二、史学影响和存佚补史	56
第三节 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的结合	60
一、民间信仰与文学叙事的互动	61
二、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转变	65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鬼故事	71
第一节 魏晋前鬼故事源流	71
第二节 志怪小说中的鬼世界	78
一、鬼的形貌	79
二、鬼的习性	84
三、禁忌与忌讳	93
第三节 异彩纷呈的鬼故事	98
一、人鬼恩仇录	99
二、冥界游历	110
三、人鬼相斗	116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典型鬼故事研究	122
第一节 人鬼婚恋故事	122
一、艳遇	124
二、求子	129
三、攀附	134
四、复生	139
五、爱情	144
第二节 冥界治鬼故事	152
一、昆仑山到泰山	153

二、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	158
三、地府到地狱·····	163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鬼故事繁荣的原因·····	170
第一节 乱世背景的生命挣扎·····	170
一、生命意识的觉醒·····	170
二、升仙无望和死亡恐惧·····	178
三、玄学清谈风气的引领·····	182
第二节 宗教信仰的推波助澜·····	188
一、民间巫鬼信仰的推动·····	189
二、道教自神其术的需要·····	196
三、佛教思想的宣扬渗透·····	202
第六章 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结合的意义和影响·····	210
第一节 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	211
一、小说观念的转变·····	211
二、小说叙事的演进·····	218
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225
第二节 文化史、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影响·····	231
一、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影响·····	231
二、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影响·····	237
结 语·····	243
参考文献·····	245

绪 论

在漫长的史前社会,人类是混沌无知的,直到灵魂观念的出现,才揭开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序幕。灵魂观念的产生历经漫长的过程,它是人类对死亡现象的长期思考和探索的结果。灵魂观念的出现开创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先河,开启了人类在精神世界里的翱翔之旅,是人类逐渐摆脱动物性的重要标志。可以说,不管“灵魂”观念在之后如何发展演变,至少它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了灵魂观念,并将死者的灵魂与现实的人事联系起来,就出现了最初的鬼魂观念。先民认为死者的灵魂具有超能力,能够控制人事,并将一些好事当成亲人灵魂的庇佑,把坏事和怪事当成灵魂在作祟。从此之后,人类的亡灵就有了使人惧怕的一面。人类在处理死者尸体时,开始思考如何安置死者灵魂的事情。随着灵魂观念的发展,先民由此及彼将灵魂观念延伸到自然界,认为自然万物都有灵魂,于是出现了“万物有灵”观念和多神信仰。

鬼神观念产生后,在趋福避祸心理支配下,先民们将“鬼魂”和“神”一样进行祭祀、崇敬,故而形成了鬼魂崇拜的一套丧葬、祭祀的仪式和禁忌观念等,有些甚至流传至今。先民们为了更加“有效”地干预、引导甚至是控制鬼魂,特别是鬼魂的活动,便有了最早的巫术行为。他们试图用“准宗教”的行为,一种超自然的行为,来把握鬼魂的活动,并为人类所用。由此也出现了专门从事巫术活动的群体——“巫覡”。早期的巫覡都是由部族中的首领担任。巫术的出现,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又一座灿烂的里程碑,人类在试图把握生死问题上,开始主动应付,用一种积极的态度试图认识和掌握那些未知的事物。

在很长的时期内,在先民的观念中,鬼神不分、鬼物不分。在万物有灵观

念支配下,不仅诸多自然物,如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虹、霓、云、霞、水、火、山、石等自然物和自然力被神化,而且人死后的“鬼魂”也被神化,作为神来崇拜。在“万物皆神”的时期,一切超自然力和自然之物,都被神化。鬼神不分的观念在夏商周三代具有一定的广泛性。鬼神成为控制原始先民心理和规范社会行为的最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国家形成之前,氏族、部落首领往往也是最大的巫覡,他们通过掌控交通鬼神的本领和权力,利用民众对鬼神的崇拜及敬畏、恐惧心理,通过各种崇拜与祭祀仪式,将个人或者整个群体的意志通过鬼神的方式传达给民众。这一阶段,“鬼神”凌驾于一切社会权力之上,鬼神的意志很容易变成氏族、部落的群体意志。进入阶级社会,国家产生后,统治者更加重视用鬼神意志来控制民众。殷商时期,统治者逐渐将原始宗教的鬼神信仰改造成具有政治性的国家宗教,以鬼神之威教化民众、维护统治。它的做法,一是将鬼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使统治者的血缘家族祖先上升为国家的祖先,以确立这个家族统治的合法性;二是将鬼神、祖先祭祀的各种礼仪实现制度化、伦理化,对鬼神、祖先的祭祀彰显出统治的权力,使鬼神的意志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和统治行为。这一阶段,通过家国统治手段,鬼神崇拜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发挥着精神控制的作用。统治阶级利用鬼神信仰和祖先崇拜,将自身与神灵的精神力量联系起来,从精神上控制民众。

西周以来,人文精神抬头,宗法制确立,人们对鬼、神、自然崇拜对象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人敬德尊礼的文化精神,疑鬼重人的人本意识,促动了神鬼分野的步伐。周人开始将道德伦理的标准融入鬼神观念,认为神是正义与善的化身,鬼是阴毒与恶的化身。神有着强大的权力和能力,鬼威慑于神的能力,服从于神的管理。另外,鬼内部也出现分类,有了善恶、贵贱、高低之分,其中祖先之鬼和部分善鬼进入神的行列。祖先之灵、善鬼与神一样,能护佑子孙,而享宗庙之祀。特别是那些成为“神”的“善鬼”,人们更是给予特别的待遇。至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理性主义思潮继续发展,鬼神信仰在一种被怀疑和反思的氛围中逐渐地消退了。鬼神崇拜对社会政治不再具有直接性、决定性的影响,但鬼神巫筮作为各国政治统治的补充,仍然从思想上、精神上间接地发挥着影响作用。

春秋战国以来,在社会的强制分化下,鬼的地位一落千丈,鬼神地位的悬

殊也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世界。“鬼”的地位的下降,本质上是“人”的地位的下降。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国家权力的集中,普通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普通人失去了交通鬼神的权利,失去了平均分配财产的机会,他们远离权力的中心,被权力边缘化。统治者将自己祖先的鬼魂供奉为“神”,实际上在传达着自己也是“神”的信息,并通过鬼神的悬殊地位、待遇和掌控祭祀的权利来无限拉大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因此,从实质上来看,鬼与神的悬殊就是普通人与掌权者之间的巨大差别。鬼魂在地位下降的同时,却拉近了与社会底层民众的距离。在春秋战国长期的动荡中,普通民众是战乱首当其冲的牺牲品。遭受无限苦难的民众也只能通过祈求鬼神来消解痛苦,鬼神成为他们唯一摆脱灾难的精神寄托。

自鬼文化根植民间之后,逐渐成为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它积极迎合民众尚实务用的传统,在民间巫师自神其术的功利目的促使下,鬼信仰逐渐呈现出世俗化的形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积淀深厚的鬼文化。鬼文化是一种极具依附力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都能找到最适宜自身生长的土壤。同时,鬼文化又是一种极具渗透力的文化,在不同的依附母体上,它都能渗透自身的文化因子,并衍生出新的文化体。

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乱,生死无常,人生如寄,死亡的恐惧又一次笼罩在时人心头,如影相随。人们极需要一种宗教信仰来缓解现实的苦痛。而此时的道教还是忌讳谈鬼说死,依旧鼓吹长生之道,佛教教义又那么繁琐、高深。当佛道二教还远离劳苦大众之时,积极吸收了佛道思想的民间鬼信文化,却焕发出勃勃生机,很好顺应了时代之殇和民生痛苦及恐惧心理。鬼文化以贴近民间,顺应时代之变,感受民众之痛,抚慰痛苦心灵,再次成为广大民众最贴心的信仰。此时,人们对鬼魂的观念和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实对大多数普通人,包括此时的很多文人而言,在乱世中完全相信羽化成仙、上天堂,是不可能的,而死后成鬼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这种观念的激发下,人们突然觉得鬼没有以前那样让人恐惧和讨厌,鬼的世界可以和人间一样,人死后在那里同样能享受人世间的快乐,弥补生前的缺憾。在这种鬼观念下,鬼信仰又由世俗迈向精神的家园,成为民众心中的一种幻想,一种寄托,成为苦难世界的避难所,甚至是他们未知的未来。在文人眼里,鬼魂逐渐成为一个意象,一种表

达人情世故的工具,一个精神世界的寄托场所。由此,鬼的世界里开始弥漫起一层薄薄的人情味来,人与鬼之间的距离突然前所未有地拉近了,人们对鬼魂的认识已跨越了宗教信仰的束缚,走向更加广阔的精神世界。因此,在鬼信仰的世俗化过程中,大量与人的生死福祸相关的、带有浓厚世俗情趣的鬼故事因势而生。

纵观鬼文化的发展演变,可谓源远流长,它经过了数万年的传承演变流传至今,对人类的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以及社会发展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已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鬼文化源自灵魂观念,它本身也是众多灵魂中神秘的灵魂——人类亡魂。灵魂观念是所有宗教的内核,都无法避开,同时,几乎所有的宗教又都是围绕死亡或者超越死亡而构建的,因此,鬼魂信仰有着超强的文化包容性和生命韧性。鬼文化从远古而来,它通过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因子,不断与新的文化母体结合,表现出强劲的生命活力。在魏晋之前,鬼文化的发展和志怪小说的发展交集较少,主要是双线发展。但志怪小说脱胎于荒诞不经、虚幻的神话,谈鬼说怪是它与生俱来的禀赋特征。神、仙、鬼、怪都是志怪小说叙事的对象,但它们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灵魂信仰文化。最初的灵魂故事,还不能称为小说,只是简单的叙事,而最初的志怪,也是简单的记录,还体现不出多少文化内涵。因此,一种信仰文化和文学叙事的真正结合,甚至融合,需要较长的过程,或者是特殊的机遇。

最初的鬼故事作者大概是巫师这类人。自周朝以来,随着巫覡职能的分化,一部分巫师的地位不断下沉。春秋战国时期,数百年的乱世,人民灾难深重,这部分巫师在民间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沃土,成为专门事鬼的民巫。这段时间民众对鬼魂的信仰和祭祀,主要不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终极关怀问题,而是为了满足世俗的需要。人们对待鬼,既通过频繁祭祀,以物质讨好;又采取宗教仪式,以巫术打压。大概从那时起,鬼故事开始被民巫大量地创作出来。民巫为了迷惑民众和自神其“术”,鬼故事便是最好的宣“道”工具。民巫创作的鬼故事,鬼多为“恶鬼”,鬼的形象很恐怖,会祟人致祸,鬼完全是与人对立的。鬼形象的极度恐惧和令人厌恶,既符合民间鬼魂观念,更是巫师为了宣扬自己施展巫术治鬼的神奇效果,以赢得民众的信赖和依靠。这比魏晋南北朝那些被鲁迅先生称为佛道“辅教之书”的志怪作品要早几百年。应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该说,早期在民间,这类鬼故事是比较多的。

两汉时,在求道成仙风气的影响下,志怪小说很少记载鬼故事。如刘向的《列仙传》《神仙传》是神仙赞歌的大合唱,唱出了富贵、权势之人的黄粱美梦,文人和社会上流阶层都忌讳谈鬼说死。与上流社会“人间仙境”相反,在民间,天灾人祸深重,简直可以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中国民众向来尚实恶虚,对待信仰也充满功利目的。社会表面上“仙话”大炽,其实鬼故事暗潮涌动,为魏晋时鬼故事的大量涌现积蓄力量。

在鬼文化、鬼故事发展演变的同时,志怪小说也在不断地发展。被称为“准小说”的志怪之作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大多记载鬼神怪异之事,始脱胎于神话母体之迹明显。因当时篇制短小,内容荒诞不经,缺乏经世致用的大道理,不为世人重视,甚至轻视。“小说”这个带有轻视意味的称谓,就是这段时间出现,并特指志怪作品。儒学兴起后,特别是两汉期间,几乎决定了当时所有文学类型的命运和发展走向。志怪小说因有悖于儒家文学观念和史学精神,被儒学所排挤。为了继续生存,处境尴尬的志怪小说跟着史学亦步亦趋,并为证明自己的史学身份而言之凿凿,以至于时人将志怪小说当作史著看待。但实质上,不管人为地将志怪作品归属到何类,其谈鬼说怪的内核从没改变,且愈来愈甚。两汉之际,沉浸在长生久视、羽化成仙的虚妄幻想中的人应该是社会上流人物,但下层民众面对天灾人祸,既没有条件服丹成仙,也没有时间修炼得道,成仙的幻想对他们只是一时的艳羡而已,所以民间鬼信仰依然大行其道。因此,鬼故事就在民间大量创造、流传,到魏晋时才被辑录在文人作品中。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期,生存忧患、死亡恐惧成了这一时期人心中挥之不去阴霾。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成全了鬼文化和志怪小说完成了结合。首先,鬼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心理寄托所和精神安慰剂,张皇鬼神成为时代的风气。历史上,越是纷乱的时代,思想上越是空前的活跃;越是痛苦的心灵,越能产生思想的激烈碰撞,越能激发人生命的本能。魏晋南北朝,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头悬刀俎、如履薄冰成为时人最真实的时代感受,死亡的威胁、生死无常的感叹如影相随。纷乱的时代、痛苦的生命,激发了人们对死亡本身及对生死意义、死后归宿的探索欲望。此时,传统的思想文化遭

到强烈的冲击,人们急需一种新的精神信仰来缓解或麻醉内心的痛苦。就这样,与死亡相关的鬼信仰从民间走向全社会,成为一个时代集体的信仰,时人痛苦的灵魂在鬼魂的信仰和鬼世界的想象中得到了暂时的消解。虽然这一精神信仰带有强烈的虚无感和不安定感,但面对战火连天、杀戮频仍的恐怖现实,人们无力改变又无法逃避,只能通过对生死的观照和思索来寻求精神上安慰和解脱,于是谈鬼说怪成为社会的风尚。其次,儒学式微,使志怪小说摆脱传统小说观念的禁锢,恣意张皇鬼神。魏晋六朝,儒学影响力下降,志怪小说最终摆脱束缚,在鬼怪的世界里自由翱翔,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峰。志怪小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的丰富性上,都要远远超过儒学占统治地位的两汉时期。混乱的时局,反而给志怪小说和鬼文化的发展、联姻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和良机,志怪小说也承担起反映时代精神的重任,谈鬼说怪和谈论生死成为其主题。志怪小说一旦摆脱了所有束缚,就可以超越天地、超越生死,搜怪猎奇,无所不能,尤其是大量奇谲斑斓的鬼怪故事,一方面满足了搜奇记异的时尚,另一方面实现了人们对生死存亡的观照。还有,佛道宗教文化的兴起,给鬼魂信仰进入文学创作带来了更多的理论支持。佛教的三世轮回、地狱说等思想给鬼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支持,使鬼故事的虚构突然获得了巨大的想象空间,鬼魂与生人的界限被打破,鬼魂的活动更加自由,鬼故事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同时,佛道两教为了传教的需要,广泛利用鬼故事来宣教,使鬼故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开来,并从民间走向全社会,创作主体由单一的巫师转向宗教人士和文人等,出现了多元化转变。这些人的参与创作,极大提高了鬼故事的文学性。另外,民间信仰与和叙事的互动,特别是文人的参与,加速了鬼文化与志怪小说融合的步伐。鬼故事由单纯的辑录到文人的有意加工创作,由粗略的记载到文人细腻地虚构,这是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结合的最关键环节。一方面,文人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造,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来加工故事,使鬼故事完全超越了巫文化之上的单纯的叙述方式。文人实录一些改造一些又创造一些民间鬼故事,对鬼之特质、鬼之形象、鬼之秉性、鬼与人的关系等等,作了完全文学化的处理。鬼魂逐渐成为艺术形象,它可以诉诸观众的视觉、听觉,使读者获得鬼魂形象特有的艺术审美感受。这些描述体现了灵性和俗性的统一,虚幻和现实的统一,表

现出丰富的想象和非凡的智慧。同时,通过艺术加工,使“鬼”与人的距离被最大限度地拉近。另一方面,文人的艺术虚构也极大地丰富了鬼文化,使之前简单的“鬼”形象逐渐丰满鲜明起来,模糊的“鬼”观念逐渐明晰起来,物魅不分的“鬼”被高度人格化,对鬼的描画也越来越生动和直观。这样,志怪小说既成了鬼故事最佳的载体,也成为鬼文化发展的沃土和母体。

中国历史上,在民间信仰基础上,曾产生过大量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后经文人加工、改编和再创作,成为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等小说的重要内容。宗教与文学的融合,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因此,在志怪小说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鬼文化通过提供素材、形象、主题、观念等多种途径渗透到文学创作中,而志怪小说又有通过辑录、加工、改编和再创作,不断充实着鬼文化的内容,丰富着鬼的形象,改变着人们的鬼观念和信仰。特别是文人在大量辑录民间鬼故事的过程中,也发现了鬼形象独具魅力的文学表现力。文人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字,使鬼文化和鬼故事有了飞跃的翅膀。鬼故事开始趋于文人的审美趣味,故事叙事能力、虚构性极大提升。另外,通过文学虚构想象和塑造,将鬼形象、阴曹地府、鬼域世界这些鬼文化、鬼观念清晰地、直观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让人惊叹不已。那些鬼魅因有了浓浓的人情味而褪去了恐怖、丑陋的面具,与生人零距离相处。这种变化在民间文化中是很难想象的。从民间文学到文人的创作,使志怪小说,甚至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文人参与鬼故事创作,最大的成就是对“女鬼”形象的塑造。在魏晋之前只有“女神”“女仙”形象,而看不到女鬼形象。自魏晋始,“女鬼”成为志怪小说,甚至整个古代文学中非常惊艳而鲜明的形象之一。在那些“女鬼”与世间凡男、书生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中,文人将自身的审美情趣融入其中,表达了个人的社会诉求,反映出文人群体的心理倾向,也将小说叙事、虚构和文学表现发挥到同时代的极致,极大地促进了志怪小说的发展,很多鬼故事原型成为后世文学经久演绎的故事。纵观民间鬼形象从丑陋、恐怖、模糊到文学意象的转变,鬼故事由迷信虚幻、搜奇记异向文人反映现实、表达情感的转变,民间信仰与文学创作的良好互动,是实现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结合的主要理路。

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的结合,既是各自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又是相互依存

的结果,二者既是文化个体,又互为母体。这种结合使鬼文化走出了单一信仰的发展模式,成为文学观照的对象,鬼形象逐渐成为一种文学书写的符号和意象,在文学领域占有独特的地位。同时,鬼文化以其自身强大的活力,丰富和促进了志怪小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发展。因此,复杂的社会背景、活跃的社会思潮和多元的宗教文化共同促成了志怪小说中鬼故事繁荣的局面。在鬼故事的影响下,志怪小说终成一代之文学,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清代,取得了很高的创作成就。

纵观鬼文化发展的历史,探究从灵魂观念到鬼信仰的完全世俗化,甚至成为文人表达社会人情的书写意象和工具,可以说鬼魂信仰在民间宗教信仰以及民间伦理道德,甚至封建统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这一缘故,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儒释道“三教”格局始终没有改变,但鬼魂信仰的作用也同样持续了两千余年。

第一章 先秦鬼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第一节 概念界定

一、鬼文化

本选题旨在研究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的复杂关系,无意深究鬼文化,因此对“鬼文化”概念的外延内涵均采用徐华龙和赖亚生两位先生的论述。徐华龙在《中国鬼文化》中指出:“鬼文化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物质文化,一是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有关鬼的实用性的器物、礼仪和活动;精神文化是指有关鬼的各种思维、意识等。这两部分的综合,才构成鬼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载体。”^①本选题研究所涉及的主要为鬼文化之精神文化部分,也就是说,有关鬼的观念等都是鬼文化的组成部分。徐氏还说:“随着研究的深入,鬼文化已从神话学、宗教学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及文化载体。人们从原来的相关的学科中,逐渐抽脱出鬼文化的部分,进行重新构建,再加上民间流传各种灵魂观念、鬼神观念以及鬼故事、传说等等,就构成中国鬼文化系统。事实上,人们越来越发现鬼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已为社会所认识,所接受。”^②徐氏告诉我们,“灵魂观念”“鬼神观念”和“鬼故事”也是鬼文化的构成部分,因此,本选题下文中对灵魂观念发展演变轨迹的梳理,就是在鬼文化的框架下进行,说明在那段时期,鬼文化的发展处于灵魂观念的发展演变阶段。

此外,赖亚生也言:“鬼文化是古代的人们对人类死亡现象及相关问题的

^① 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页。

^② 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页。

思考所带来的观念和行为。它大体由以信仰为核心的观念(如鬼魂观念、冥界观念)和仪式、风俗为表现形式的行为事项(如丧葬、祭鬼、驱鬼、招魂、鬼故事的讲述以及鬼事禁忌)构成一个整体。前者是抽象的、隐秘的、深层的,后者则是具体的,显现的、表层的,是对前者的‘物化’。除此之外,各种有关鬼的小说、戏曲、美术、建筑、音乐、舞蹈、歌谣、谚语、俗语等,也属鬼文化范畴。”^①赖氏的鬼文化包含更多内容,除了指出鬼魂观念、冥界观念为鬼文化外,也包含了鬼文化出现时间的信息,即人类自有了鬼魂观念和对死者灵魂的安置,就有了鬼文化,可见鬼文化出现的时间很早。对此,赖氏也说过:“中国的鬼文化在原始社会的土壤中萌生,同时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进化而有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变异、更新的过程。”^②

总而言之,“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从民俗学角度来说,鬼文化是人们有关鬼的观念、信仰、心态、行为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总和。综合归纳主要包括“鬼”的涵义、鬼的模样、鬼的行为、鬼的类型、招魂招鬼活动、祭鬼驱鬼法术、丧葬仪式、鬼魂信仰和鬼故事等方面。

二、鬼故事

鬼故事,广而言之就是与“鬼魂”有关的故事。鬼故事是鬼文化研究的通用的一个概念,如徐华龙说过:“中国神话形成的中介,就是鬼话,离开了这个中介,就没有了神话这较高一级的形态。……在第一阶段中,出现鬼之后,随之亦出现了有关鬼的种种传闻,即可称为鬼话,它是形成中国神话的重要阶梯。”^③徐氏在这里将鬼故事与“神话”相对,称之为“鬼话”。徐氏在《魏晋六朝鬼文化的繁荣及其原因》^④中继续沿用这一称谓。另外,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其《鬼话与神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⑤中,也用了鬼话这一

① 赖亚生:《神秘的鬼魂世界——中国鬼文化探秘》,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 页。

② 赖亚生:《神秘的鬼魂世界——中国鬼文化探秘》,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 页。

③ 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页。

④ 徐华龙:《魏晋六朝鬼文化的繁荣及其原因》,《六朝历史与吴文化转型高层论坛论文集》2007 年第 5—6 期。

⑤ 李福清:《鬼话与神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